

「國史館 101 年度修纂人員學術討論會」略述

《國史研究通訊》編輯部

國史館依法掌理中華民國史與臺灣史的修纂和研究、重要歷史檔案、文獻及圖書的蒐藏和應用，修纂人員即負國史研究之任務。每年國史館修纂人員除了參與館外各種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著作，同時也於國史館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上宣讀研究成果。民國 101 年間國史館所舉辦的學術討論會，除了 9 月 13-14 日「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已有部分修纂人員發表文章外，12 月 25 日國史館修纂處亦舉辦一場小型學術討論會，增加修纂人員學術切磋機會，同時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李朝津教授、國立交通大學社會人文學系黃紹恆教授以及考試委員浦忠成教授等人擔任評論人。討論會發表文章略述如下（依發表順序）：

張世瑛：派系與宣傳—中國國民黨內的漫畫戰（1928-1931）

本文題旨在探討 1928-1931 年間，國民黨黨內最重要的兩股勢力—以蔣中正為首的南京中央及遙奉汪精衛為領袖的改組派，雙方在這段時間裡的宣傳攻勢，尤以國民黨宣傳部指導下的《中央畫刊》上的政宣漫畫，為主要分析的取樣對象。1929 年 8 月 3 日，《中央日報》發行附刊《中央畫刊》，針對改組派的漫畫攻勢可區分為五個論述重點：（一）民族主義的指控：改組派與蘇俄、中央的關係。（二）發動內戰與破

壞統一：改組派與國內實力派軍人的關係。

(三) 支持改組派的群眾基礎：青年國民黨員。(四) 對改組派個別人物的攻擊。(五) 國民黨的法統之爭。

從雙方於 1928-1931 年間所進行的這場雖不見刀光血影、卻更驚心動魄的宣傳戰爭裡，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不對等的漫畫戰，改組派一方從未運用漫畫這項媒介，作為向南京中央發出戰爭號角的工具。因 1927 年武漢國民政府結束後，作為在野的改組派，面對南京中央鋪天蓋地而來的打壓及查禁，因缺乏公部門或黨機器的龐大資源，難以運用漫畫這項通俗文宣，也極度缺乏所需要的媒體空間。

南京中央針對汪政權的漫畫文宣，在宣傳文字與漫畫圖像之間呈現高度一致性的特徵。對南京中央來說，顯示此一階段改組派才是最重要的黨內敵人。透過再詮釋 1928-1931 年《中央畫刊》，可以確定清黨之後國民黨並未就此割捨漫畫宣傳，然而這段時間非常的短暫，1931 年後國民黨文宣部門不再著力於漫畫等通俗文宣，也幾乎沒有任何的漫畫作品，確實的原因還需要更多史料進一步的佐證，但回顧民國時期，國民黨的宣傳漫畫在黨內不同派系與中國共產黨的裡外交迫下，黨部宣傳搖擺於左、右之間的政治立場與創作理念，明顯帶著揮之不去、欲掩彌彰的曖昧性與模糊性。

蕭李居：中日戰爭初期陶德曼調停與防共問題

藉由考察中日戰爭陶德曼調停條件內容，可知日本對中國最基本要求是維持滿洲國與防共駐兵。若以日本是以滿洲國作為對蘇軍事的前進基本的立場來看，可簡化為防共問題。而該問題成為日本的對華政策係源於戰前的「廣田三原則」與「對支實行策」，說明調停條件是「廣田三原則」的延續，表示日本的對華政策在戰爭前後基本上並未有立即的轉變。

另一方面，由國際關係體系角度觀之，蔣中正寄望於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戰爭，是建立於認同華盛頓體系的立場上，希望在華盛頓體系的架構下處理中日問題。就日本而言，自九一八事變衝撞華盛頓體系，1935-36 年確立追求東亞防共體系後，陶德曼調停就是立基於建立此新體系的脈絡下所推動。當布魯塞爾會議無所作為並停會後，可謂代表華盛頓體系正式結束。而蔣中正曾一度考慮接受調停條件時，說明中國方面考慮接受日本的東亞防共體系，調停失敗後日本另與中國傀儡政權合作建立東亞防共體系。因此陶德曼調停可以說是促使華盛頓體系正式終結，同時也是日本公開邁向追求東亞防共體系之路的開始。

林秋敏：中華民國第一屆女性立法委員背景之探討

第一屆立法委員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次透過全國普選而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掌

握立法權，且任期長達 44 年，對中華民國各方面的影響不可小覷。本文旨在探討第一屆女性立法委員之出身背景，因立委產生時間不同，因此將 127 位女性立委分成 1948 年選舉、遷臺後遞補與增選、增額委員兩組，並就年齡、黨籍、教育程度、留學國別、所學性質、工作經歷、議事經歷以及參與婦女組織等方面加以觀察，發現兩組女性立委除了所學性質以及黨政軍職之外的其他行業，其餘各部分所占最大比例者皆相同。從本文可知，第一屆女性立委的組合以中年且具高等學歷者為主，在當選立法委員之前，不論擔任黨政軍職或具有議事經歷、參與婦女組織者都很普遍，其中亦不乏婦運人士。

高素蘭：國民政府對新疆伊寧事變之因應（1944-1949）

蘇聯不甘心盛世才脫離其掌控，又忌憚國際局勢，既不能公開採取對策，乃放棄以往利用漢人為侵略工具的一貫策略，改為策動新疆少數民族主義分子的反漢情緒和宗教信仰來與漢人鬥爭，以示報復。一面煽動阿山事變，一面又在伊寧製造大規模變亂，希冀以動亂結果造成一特殊地區，擴展其勢力範圍。1944 年底，北疆發生伊寧事變（1949 年後大陸方面稱之「三區革命」），蘇聯暗中支持事變發動者，佔領伊犁、塔城及阿山三個行政區，並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欲脫離中國獨

立。

國民政府不僅失去伊、塔、阿三區的統治，其他地區也不穩定，如何保持新疆政局的穩定，鞏固國民政府在新疆的統治地位，維護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遂成為國府的一重要課題。國民政府為挽救新疆危局，特派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赴新疆處理，並與伊寧方面進行多次談判。最後成立多民族之聯合政府，新疆危機暫告緩和，然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各群眾暴動，新疆政局依舊動盪不安。

葉健青：達賴十四與西藏政教分離

西藏地處邊陲，其影響力和受重視程度本不高，中共進入西藏，達賴十四出走印度，至世界各地宣揚藏文化和關懷人權，並為西藏人民的前途努力奮鬥。達賴十四雖然獲得 1989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西藏境內的人權並不見改善。達賴十四幾次派員與中共討論西藏前途皆無進展。

1995 年 12 月 8 日班禪十一世於西藏札什倫布寺在中共國務院委員李鐵映主持下舉行坐床典禮，深化中共對西藏的控制，此舉令達賴十四深感憂心西藏的前途，因為西藏新的達賴是藉由轉世制度產生，而西藏又屬於政教合一的政府。

達賴十四擔心其圓寂後西藏完全成為中共所控制，藏文化會因而流失，加以最近藏人為中共的打壓西藏前途引發藏人自焚

事件迭起，達賴十四為了藏人的前途著想，乃思考西藏的未來和下一世達賴轉世的問題，期望西藏的前途由人民以民主方式來決定，包括達賴轉世是否存廢都由人民以民主方式來決定。因而達賴十四於 2011 年 3 月 14 日宣佈退出政壇，希望政教能分離，改變西藏傳統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宣布不再過問政治事務，本身則專注於西藏文化的發揚和宗教事務，置於制高點來關懷西藏，政治問題改由西藏流亡政府負責，預防中共對下一世達賴的控制。達賴十四相信唯有政教分離才有可能拯救西藏的前途，更希望因此而獲得世界各國的支持。

周琇環：從《五記》看蔣中正的基督教信仰

蔣中正除了是影響中國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外，也是虔誠的基督教信徒，這些可由其日記及各項著作中看出端倪。本文主要根據《五記》的記載，參考《事略稿本》及過去的研究結果，由基督徒信仰心路歷程的角度出發，審視蔣中正的信仰。

蔣氏不是因為宋家傳教，為討好宋家，他就立刻接受基督教，而是入教 3 年後，依據個人抉擇，才受洗歸入主名。生活中的經歷也加深他的信仰，並認識耶穌犧牲、忍耐、奮鬥、純一、博愛的美德，以耶穌為師範。1936 年，蔣氏清楚尋求神導引他的人生，配合早就建立起宗教生活習慣，明白自己所承受的救中國、發揚基督的責任。甚至認為欲統一世界，平定天下，決非從事武力

所能成功，必以教化之力，實行三民主義，以及實現耶教之精神。

總之，蔣氏的基督教信仰，究竟深深影響他個人的人生經歷，相對地也因著蔣氏的信仰，使得基督教成為民國的重要宗教之一。

周美華：從「慈心」有機到「里仁」為美——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的草創、運作與發展

「以台灣的環境，要開展有機農業是不可能的！」當年不論是種植的農民、大學教授、農業專家或有機業者，站在生產、銷售、消費…任何一個角度，都異口同聲這麼說，但慈心基金會卻創造了這個不可能。

慈心基金會成立於 1997 年 3 月，幕後推手是以弘傳實踐《菩提道次第廣論》、建立教法為志業的日常法師。法師結合佛法的內涵來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不僅讓產、銷、消三者良性循環、和合運轉——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關照生活、生態與生命；銷售者支持生產者，關心消費者，成為雙方可信賴的朋友；消費者則感恩生產者，信任銷售者，歡喜做公益——形成一個良善的共業網，還結合有機保育生態、淨化山林、淨化水源，最後成為政府授權、乃至美國 USDA 認證的驗證機構，以仲介角色引領臺灣有機走上國際舞台。

陳中禹：從二二八事件中的原住民動態看原住民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

二二八事件中的相關檔案紀錄中，相關原住民參與「騷動」、「騷亂」的紀錄直可說連篇累牘，只是在官方後續的鎮壓、緩靖過程中，相關形象有了很大的轉變，變成官方表彰、嘉獎的協力對象。對於這樣的轉變，過去少有人提及，更遑論解釋箇中的原因。何以至此，因為目前對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原住民動態，僅有如前述之少數個案研究，缺少全面性的檢視與理解。本文全面性地耙梳二二八事件中的相關檔案、史料、口傳紀錄及新聞報導，將全臺分為北、中、南、東四區，分區檢視二二八事件騷亂階段中各地區的原住民動態，綜合性地討論事件中對原住民形象的轉變，透過釐清原住民在事件中不同階段的角色，突顯出原住民在二二八事件中，開始被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在臺灣山地區域控制的協力者，由此反映出形象轉化的主要原因及所代表的歷史意義。

何鳳嬌：臺灣土地銀行公產代管部與戰後公產的管理（1952-1960）

戰後國民政府雖先後成立機關，管理接收日本在臺的公、私有財產，但因初期政局不穩，欠缺人力、經費，管理機關只就帳面資料作管理，致有被侵占或是閒置現象，造成國家權益莫大損失。

1952年7月臺灣土地銀行在政府的指定下，為了代管公產，成立公產代管部，代

管國有特種財產8年6個月，期間雖動輒得咎，加上早期管理之疏忽，飽受政府與社會輿論之指責，但也達成：1. 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處置國有特種房地產，替政府賺進375,212,251.37元。2. 釐清公產內容，建立財產登記制度，並對房地產採事前分割登記，做到產帳確實，奠下日後國有財產局管理之基礎。3. 培養公產管理人才，使專業人才不致散失，業務不致中斷。

陳曼華：從臺北雙年展及威尼斯雙年展看藝術史書寫

臺北市立美術館為推動當代藝術所舉辦的雙年展，因其由官方主辦所代表的權威位置、媒體的大量報導、策展人及藝術家獲選後帶來的知名度提升等效益，成為臺灣藝壇關注的焦點。筆者曾於另文〈想像的台灣當代藝術—從北美館「新展望展」到「台北雙年展」的查考〉中反省過往關於雙年展研究多以其引進國外評審及策展人導致臺灣藝術主體性受威脅為批判核心，作品中所表現的臺灣藝術樣貌反而受到忽略。而當策展主題與體制的批判取代了作品所再現的世界，臺灣藝術在論述中某種程度卻成了缺席者。本文試圖進一步探討：透過雙年展的體制，書寫出怎樣的臺灣當代藝術史？從評審、評選方式、策展人、藝術家、策展論述、作品等面向，爬梳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狀態，指出其中的契機與侷限。